

發展北都大學城 培育人才升級產業

教聯筆陣

韓東曉 | 教聯會理事

北都大學城的建設，不僅是香港高等教育空間拓展的必然選擇，更是融入國家戰略、推動經濟轉型的重要機遇。香港近年大力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其中北都大學城的構想，是整個區域策略的重要一環。從人才培養、產業升級到區域均衡發展，北都大學城不單是一個教育設施群，更是一個牽動香港長遠競爭力的關鍵平台。

在2024/25年度，在香港就讀專上課程的非本地學生達到近8萬人，他們來自近一百個國家及地區，相較於2023/24年度的近6.5萬人，已達到近20%的增長。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調高2026/27年度非本地生人數上限，由相當於本地學額數目的40%增至50%。再加上西方一些熱門的留學國家政策混亂，經濟增長放緩，「留學香港」品牌愈受關注。

強化「南金融北創科」格局

從整體空間與人口布局角度看，香港發展一直高度集中於維港兩岸及九龍市區，土地緊張、樓價高企，校舍發展亦受嚴重制約。新界北擁有較大土地發展潛力，在交通基建持續改善下，具備承接高校校園及科研設施的條件。把大學及科研資源向北拓展，有助打破過往「教育資源過度集中港九」的格局，推動城市由「單核心」走向「多中心」發展。

國家大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

融合發展及創科發展，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定位，包括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背後均離不開高端人才與知識產出。過去三年，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共收到近60萬宗申請，逾41萬宗獲批。面對如此大量的人才和資源湧入香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更顯重要。新界北靠近深圳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如能在當地建立高密度的大學與科研機構群，有利於與內地創科平台對接，形成人才、技術與產業的跨境互動。同時，這個科技創新社區也能幫助紓緩香港的人口老化及產業結構轉型壓力，也可解決因單靠金融與房地產，難以支撐香港長遠經濟增長等潛在問題。發展北都大學城，意味着培養新一代科技、人文社會及專業服務人才，同時提供更多學術與職業教育的選擇，這對提升整體人力資本質素、支撐多元產業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北部都會區被視為「北創科」的核心區域，而北都大學城正是創科生態的源頭之一。大學不只是授課場所，也是科研、創業及技術落地的基地。當多所大學及研究機構聚集新界北，並與河套、科學園、新田科技城等創科平台互相銜接時，便有望形成由基礎研究、應用研發到產品試驗、產業化的完整價值鏈。與此同時，香港島和九龍的傳統核心商業區繼續鞏固其「南金融」角色，金融機構可以為北部都會區提供融資、併購及風險管理服務，實現資本與

技術的雙向循環，有助香港在區域和國際競爭中凸顯自身優勢。

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與供應

結合當前形勢，近年來港升學的非本地學生數量持續上升，而各大學在市區擴展校園受到土地限制，難以大幅增加學額。在發展「北創科」方面，因應實際情況透過在北都區預留較大面積土地發展北都大學城，不僅可以讓現有大學開設新校區，也為新型院校、應用科學大學及職業機構提供成長空間。更重要的是，大學城可以按產業需求與區域定位，設計具特色的學科與課程。這種由「學科」到「產業」再到「區域」三者的協同，有利香港打造一個更有競爭力和吸引力的高等教育體系。

總體而言，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推動教育現代化和大灣區深度融合，而國家「十五五」規劃對這些重點發展領域作出更全面、更精準、更細緻的戰略部署及進一步推動發展步伐。若把北都大學城與上述戰略有機結合，便可在政策資源、科研項目及人才交流方面取得先機。發展北都大學城，對香港而言既是教育與創科政策的延伸，也是城市與區域發展策略的核心，有助香港鞏固國際高等教育及創科中心的地位，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同時為新界北帶來人口與社區活力。

積極迎接就業轉型 適應人工智能時代

張俊獅

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客座副教授



第三眼 觀世界

未來人工智能科技將會更加普及應用。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不單在科技之上，更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結構，特別是就業崗位將會出現大幅度調整。年輕人應以聚焦自我能力的提升，擁抱科技的未來，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

美國的科技大企當年推出ChatGPT時，備受追捧，很多人都認為這種科技能徹底改變社會，用戶也持續增加。直至2025年9月，該平台每周有七億活躍用戶使用。美國有很多大企的數據模型，都會使用到ChatGPT。當人工智能深度賦能創意產業，新型職業正成為驅動行業發展的新引擎。可是，人工智能模型的廣泛應用，令文書處理人員、畫師、攝影師，甚至模特兒及演員的工作，逐漸被取代。過往在資訊科技行業甚為吃香的網絡工程師和編程員，近期都成為科企裁員的目標。人工智能與各行各業融合愈發深入，催生了不少新職業新崗位，也引發人們關於就業替代的擔憂。

事實上，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技術，例如ChatGPT、Grok、DeepSeek等，可以代替很多繁瑣的文字工作。這些模型的應用面非常廣，使用者可以潤飾文字，改寫內容，進行文法檢查，進行歸納摘要，又可以製作歌曲、繪畫、製作照片與視頻。就算不擅編程，用戶甚至可以請人工智能模型輔助製作程式。人工智能還可以解答用戶生活和日常工作的疑難，幫忙做一些構思、頭腦風暴的簡單工作。很多人說這些科技帶來很多方便，既促進創新又增加工作效率。許多美國科技公司更斥巨資增加相應投資。筆者是非常認同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十分體會到人工智能所發揮的作用，但也同時感受到，這股新科技熱潮正淘汰現有傳統產業，也導致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富有的企業家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而增加收入，但更多普羅大眾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而失去工作，陷入貧窮的境地。

可見，在不久的將來，社會將出現低技術工人失業潮，特別是重複性體力勞動崗位正逐步被人工智能系統替代。各行各業的從業員需要活用人工智能，不斷提升自身的價值，積極擁抱數智時代變革，以更强的內核實力爭取更多就業自主性，繼續在市場發揮作用，否則隨着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他們便會面臨失業的風險。

我國在應用人工智能的模式與西方不同，制度上的差異令我國就業市場受人工智能衝擊的程度得到減緩。筆者會在以後的專欄會向讀者逐一剖析。

把握數據治理新機遇 賦能創新科技中心建設

陳柏瑾

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

熊偉

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研究員

世界數據組織 (World Data Organization) 於3月3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是全球首個旨在推動數據發展與治理實踐的專業性國際組織。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世界數據組織成立致賀信，強調「中國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支持世界數據組織發揮作用，同各方一道凝聚數據治理規則共識，推動數智技術創新，促進數據安全有序流動和高效開發利用，服務全球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讓數據紅利更好造福各國人民。」

世界數據組織的成立，代表着全球數據治理正在從過去分散、碎片、帶有強烈地緣政治色彩的博弈，逐步走向更強調規則協調、標準銜接、能力共建的階段。香港本身就是一個以開放見長、以聯通取勝的國際城市。數據時代下，資金流、物流、信息流之外，數據流正在成為新的「關鍵流」。未來香港能否繼續保持國際樞紐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能否進一步升級為數據流通、規則銜接、場景轉化和可信服務的關鍵節點。

給香港充分的發揮空間

世界數據組織落戶北京，對香港至少帶來三重機遇。

第一，長期以來，全球數據治理存在規則碎片化問題，不同法域在數據合規、隱私保護、本地化要求、跨境傳輸等方面差異明顯。世界數據組織的重要價值，就在於推動形成行業共識、標準

建議和最佳實踐，幫助各方降低合規成本、增強互認基礎。香港擁有普通法體系、國際化營商環境、成熟的金融和專業服務業，又「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完全有條件將自身優勢轉化為制度影響力。

第二，加快AI基礎設施和產業生態建設。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已於2024年投入運作，香港數字政策辦公室今年初披露，本港算力總規模已達5,000 PFLOPS，其中約3,000 PFLOPS來自數碼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特區政府推出的30億元人工智能資助計劃，至今已批出接近30個項目。世界數據組織如果未來推動更多跨境數據協作、標準銜接和場景合作，香港的算力、科研和應用生態便可更直接接上國際需求。

第三，深化「內聯外通」的機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已於2025年12月正式開園，特區政府並明確提出，要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推動內地數據在合規安全保障下跨境流動到河套香港園區用於科研，助力AI應用測試與創新。未來若能與世界數據組織倡導的數據合作規則、能力建設和應用生態形成對接，香港就能把河套從「地理上的合作區」進一步提升為「數據治理與科技創新的制度接口」。

發掘新增長點

還應看到，香港的優勢不僅在科技，更在服務。隨着區域貿易數字

化、供應鏈智能化和跨境服務在線化加速，企業對數據合規、跨境認證、數字金融、爭議解決、網絡安全和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世界數據組織一旦推動形成更具可比性的規則框架，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便有望迎來新的增長空間。

香港要更積極嵌入國際規則平台，主動對接世界數據組織未來的研究、標準、培訓和項目合作，把香港經驗帶進去，也把國際前沿議題引進來。業界要盡快建立「數據合規即競爭力」的觀念。未來企業「出海」，拚的不只是產品和價格，也包括數據治理能力。香港工商界、金融界、創科界應提早熟悉內地、灣區及國際數據規則的銜接邏輯，提升隱私保護、數據分類分級、安全管理和跨境傳輸安排的能力，避免把數據治理視為單純的成本項，而應把它當成打開國際市場的通行證。

大學與科研機構要把握能力建設窗口。世界數據組織強調彌合數據鴻溝、加強能力建設，這對香港高校和研究機構而言，是開展聯合研究、標準研究、人才培養和案例輸出的機會。

北京為世界數據治理搭起了新平台，香港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把自身建設成這個平台最有活力、最有穿透力、最具國際解釋力的重要接口。這樣，香港不僅能夠分享國家推動全球數據治理帶來的時代機遇，更能在服務國家所需中，開拓自身發展新空間。

建設「全球教育中心」 增強香港競爭力

郭玲麗

資深教育工作者



特區政府正編制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對重點發展領域作出更全面、更精準、更細緻的戰略部署，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去年出台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戰略方向。隨着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展，筆者認為這正是香港必須把握重新定位、補齊短板的關鍵窗口，也是轉型的重大契機。這不僅是國家的戰略目標，更是香港的時代機遇。筆者建議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應將香港定位為「全球教育中心」，以強化香港在全球教育市場的競爭力與影響力。

提升知識輸出能力

以美國為例，許多大學城憑藉一所頂尖大學帶動整個城市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充分體現了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的深遠影響。香港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非本地學生比例20%，與澳洲21%相若，高於英國19%，但香港教育服務對GDP的貢獻長期維持在1.2%至1.4%之間，遠低於美國5.2%、英國6.0%及澳洲4.7%。這一組數字說明，香港教育資源優勢尚未充分轉化為系統性競爭力與經濟動能，要改變現況，必須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與標準輸出。

隨着特區政府進一步擴大本港大學招收非本地生限額，2024/2025學年非本地學生人數已增至約8萬人，估計每年學費收入達160億元。院校為配合互聯互通的新時代，在生源增加的背景下開設了不少新課程。未來的所有課程設計都應加強培養學生的「全球勝任力」，即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核心素養，涵蓋認知、情感與實踐三個層面，透過持續優化課程質量與培養學生能力，為國家及全球發展貢獻人才力量。這意味着，香港不僅要在規模上擴張，更應在質素上提升，確保畢業生具備國際視野與競爭力，使他們能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分析全球議題、理解不同觀點，進而促進持續發展。

目前，香港在一些國際性調查與排名中，「國際教職員比例」方面得分突出，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香港教育國際化的外在特徵。然而，要從「國際教育樞紐」真正提升為「全球教育中心」，就不能僅停留於外在表象，更需要具備深層次的知識輸出能力與標準制定權。具體而言，這需要通過教育知識的生產、教育經驗的傳播，讓中國的教育理念、實踐方案與發展智慧，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並得到廣泛傳播，從而助力各國教育發展、影響世界教育趨勢。簡言之，這是香港教育從過去的「跟隨者」走向「引領者」的質變。

發展專業資歷認證服務

香港的獨特優勢在於「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網絡、成熟的法治環境與科研誠信體系。這些條件使其具備潛力發展成為亞太區高等教育質量標準與專業資歷認證中心，更能通過教育交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理念。然而，當前政策過度集中於專上教育的規模擴張，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職業教育現代化、產學研深度融合等維度仍缺乏系統性頂層設計。現時特區政府已成立由政府司長帶領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優先推動以下兩項工作：第一，建立跨部門平台，統籌「全球教育中心」相關政策，並制定涵蓋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終身學習的全鏈發展藍圖；第二，研究改革現行院校撥款機制，將質量、標準輸出與國際影響力納入核心指標。

特區政府應把握「十五五」關鍵發展時機，跳出過去「教育即學校教育」的傳統框架，為香港自身經濟注入新動能，成為國家戰略的關鍵支點。

輸出綠電與算力 打造西部成AI高地

詹培勳

瞻行資本創始人



筆者早前到西藏林芝考察，沿途看到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相關建設如火如荼，感觸很深。這個總投資約1.2萬億元、建設5座梯級電站的國家級工程，除了是浩大的水電項目，更是未來中國智能經濟的一塊底座。它提醒筆者：在AI時代，能源的意義，已不止於「發多少電」，而在於能否把電轉化為更高附加值的算力、模型能力與產業智能服務。

中國下一輪出口，是把綠電轉成算力，再把算力轉成可計量、可調用、可結算的「詞元」服務輸出全球。國家數據局近日已明確指出，我國日均詞元調用量到2026年3月已超過140萬億，詞元正成為連接技術供給與商業需求的結算單位。

美國科技巨頭黃仁勳最近把AI產業概括為「五層蛋糕」：能源、芯片、基礎

設施、模型、應用。這個說法最重要的啟示，不是再度神化模型，而是把能源重新放回了AI競爭的起點。沒有穩定、低成本、可持續的電，就沒有大規模、低成本、可持續的推理，更談不上AI真正進入千行百業。

若從這一視角回看我國，會發現我國優勢並不在模型公司。2025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達103,682億千瓦時；截至2025年底，可再生能源裝機達23.4億千瓦，約佔全國總裝機六成，風電和太陽能合計18.4億千瓦，已歷史性超過火電；全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3.99萬億千瓦時，新增綠電基本覆蓋全社會用電增量。換言之，中國已不只是新能源大國，更在形成支撐智能經濟擴張的綠色能源網絡。

更關鍵的是，這套底座正與算力體系加速耦合。國家數據局披露，截至2025年底，中國智算總規模已達159萬PFLOPS，其中八大國家樞紐和十大集群

佔比超過80%；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寫入「算電協同」，而構建多層次算力設施體系和全國一體化算力網也已列入國家「十五五」規劃。未來調度的不只是電，更是數據與計算任務本身。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有電就能贏」。詞元經濟要真正成為出口能力，仍取決於芯片系統、網絡調度、數據治理、跨境規則與場景落地。尤其在數字貿易層面，WTO關於電子傳輸不徵收關稅的安排已在2026年3月31日到期，全球規則仍有不確定性。也就是說，未來競爭不只是成本戰，更是基礎設施、制度與國際規則的系統戰。

所以，我國下一輪最值得重估的，不一定只是「賣出多少電」，而是能否把綠電、算力、數據、模型和應用連成閉環，再把這種閉環能力輸出為全球可購買的智能服務。若這一點成立，那麼我國西部就不只是能源後方，更可能是AI時代的新高地。